

思想翻譯

《文化研究》第二十七期（2018年秋季）：212-225

生命權力以其敏感形式來檢驗： 當代異質空間民族誌計畫的簡要導論*

Le biopouvoir à l'épreuve de ses formes sensibles. Brève introduction
à un projet d'ethnographies des hétérotopies contemporaines

阿吉耶 Michel AGIER 著
陳瑞樺 Jui-Hua CHEN 譯

如果人類學，這門探討地方意義與關係的科學，以務實的態度，採取**哲學之用途**¹這樣的視角，那麼它將會讓自己採用生命權力(biopouvoir)與異質空間(hétérotopie)這兩個從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分析得到的概念。這兩個概念並不完全重疊，但並肩而行、相互召喚。本文也將如此處理這兩個概念，我們將從作為兩者目標或對象的個體所擁有的經驗出發。以此方式檢驗之後，這些概念將能夠幫助人類學家建構一種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所探討的是地方和認同的浮現及源起（而非其失落），並以流亡(exil)而非拔根(déracinement)作為二十一世紀主要的個人與政治境況。對人類學而言，這意味著從今日實際可觀察的境況以及研究者自身所處的當代性來思考現在與到一來(l'à-venir)，而非從身分、地域、記憶的重構，以及其他從靈感出發從而讓當代性變得冗長囉嗦的修辭來思考。如此也能在人類學與哲學之間創造一個交換、對話的場域。為什麼不呢？

投稿日期：2018年12月23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1月25日。

* 譯註：本文原刊於*Chimères* 74(2010): 259-270.

1 編註：原文斜體處譯文以粗體表示，下不贅註。

一、生命權力、營區與政治：一種無主體的哲學

「生命權力」是一種關乎生命及死亡的權力。如果它有一個政治視域，那將會是極權主義，甚至是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que)，這個詞所指涉的意義可以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說法來表明：「極權主義所趨向的並非對於人的暴虐統治，而是一個人在其中顯得多餘的體系」(Arendt 1995: 197; Caloz-Tschopp 2000)。在這場生與進行中的死兩者的不穩定平衡裡，生命權力是指一種「權力技術」，此種技術預設了在個體和「人口」之間的透明。有一整套工具在處理、控制和管理「人口」的生命——那是沉默的生命，因為他們被化約為極簡的假想，成為由去社會化的個體所組成的群眾，「人類」所共同具有的身體；推到極致，從「絕對的生命權利」(l'absolu droit à la vie, Foucault 1997; Brossat 2010)之效果來考察，甚至可以說他們被歸為動物。當這些由無所體現以及無靈魂的人類（或者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後來所評述的「裸命」[vies nues]）所構成的人口，經由測量、計算、篩檢而被客體化與類別化，由此消除了每個生命的政治或社會敘事的主體性，他們就變成可管理的事物。因此，不管生命權力的目的是什麼（拯救某些生命，同時讓其他一些生命死去，將某些「人口」隔離開來，以便保護他們或是保護我們免於被他們所侵犯等等），在生命權力和政治(la politique)之間，有一種具有邏輯且清楚明白的對立或緊張；從概念的分析用途此一觀點來看，這種對立或緊張具有促生結構的能力(structurante)。

但在傅柯連結生命權力與知識（或者知識和技術）之處，阿岡本(1995, 1997)則融合了生命權力和政治。阿岡本將生命政治這個受到傅柯的分析所啟發的概念推展到一定的抽象層次並擴展其政治指涉，直到傅柯的分析所未到達之處，使生命權力成為當代世界終極的政治視域。他的做法主要是將「營區」(camp)這種形式提出作為範例場所。

有種生命政治轉型的模型位於政治的核心，此種模型的明確體現就是營區——這個語式是循環性的、悲觀的、修辭的，雖然繞了一圈又回到

出發點，然而它卻具有重啓實證調查的好處，就像是某種啓動！因爲，經由這種抽象的、演繹的形象表現，營區最終被歸爲一種純粹的死亡空間，就如同納粹集中營。阿岡本最終將營區的一般形象和意義化約於納粹集中營，它被「大屠殺的幽靈」所糾纏，只被銘刻在「死亡視域」，就如同阿蘭·布洛薩(Alain Brossat[2008])所註解一般。此種取徑讓我們無法看到兩件事：一方面，大屠殺並不必然需要集中營，它也可以在街道進行，就如同1994年的基加利(Kigali)²；另一方面，營區所代表的是多重形式及多重功能的空間。它是對不受歡迎者(*undésirables*)進行全球性治理的空間，但也是常態性例外(*l'exception ordinaire*)的社會化空間，最終則是政治空間(Agier 2008; Bernardot 2008; Kobelinski et Makaremi 2009)。

此外，從人類學理論及論戰的觀點來看，生命權力和政治之間的重疊並不成立。更正確地說，「在政治變成生命政治的時刻，營區是政治空間的典範」(Agamben 1997: 184)，這樣的語式假設了社會空間的結構性運作，一個沒有主體的世界，它讓生命權力全然地物化。所有這些再將主體和政治主體化的問題放在一邊。³正是這種缺席讓人們得以在邏輯上得出結論說「城邦的終結」，以及營區的支配就如同「西方的生命政治典範」。由此，政治就和生命權力的行使混同，營區就是生命權力的空間化，而主體化的問題依然未被探討。

2 譯註：基加利爲盧安達首都。1994年4月6日到7月4日，胡圖族總統哈比亞里瑪納在首都基加利上空因座機爆炸身亡，引發胡圖人對圖西人的報復殺戮；不到百日，便有八十到八十五萬人被殺，其中包括一萬到三萬名因持反對意見而被認爲是叛徒的胡圖人，而當時盧安達的圖西人僅約九十萬人（總人口約七百五十萬人）。

3 主體人類學預設了一種反思，這點充分顯露了我們的主張，這種反思讓我們得以了解以下兩者的深刻分歧，並從中得出結果。這兩者一方面是傅柯意義下的「主體化」，事實上它將我們遣回從屬(*sujétion*)狀態，也就是說，身體及身分認同類屬對於一種主權權力的臣服，這在相當大程度上仍是一種結構主義的觀點；另一方面是一種在言語主體此一意義下的主體化，它所依據的是一種對於解放(*émancipation*)時刻及運動所做的情境分析，這種解放的政治意義在對抗認同的指定作用和對抗生命權力的秩序，由此，推到極限，這種主體化就如同一種反結構。這種反結構有時會採用以社群對抗社會的語言，這沒有甚麼好訝異的，對於起事的倡議和拒絕，在人類學裡甚至可說是一種相當經典的形象。從這個在結構和情境之間的分岔點開始，主體表現的意義就全然不同了。

二、一塊塊的浮動空間：從生命權力到異質空間

我在此處要對生命權力、政治和營區這三者之間所形成的三角關係提出異議，最終目的在提出臨時營地(campement)和族群隔離聚居區(ghetto)作為**生命權力的敏感型式**，同時作為一種主體化過程的發生之所，此一主體化或可逃脫生命權力的命令，並且藉由政治對其提出反駁、甚至進行對抗。實際上，就這種對於生命權力的無主體視野，人類學家能夠提出的問題首先在於：我們能否**檢驗**生命權力？其效力何在？在從政治的核心或原則來思考它之前，我們應該先回到它所建立的治理現實。在檢驗其「真實性」之前，應該先檢視它透過人造物(artefacts)和空間配置所建構的現實；也就是說，透過不可或缺的形式——必須描繪出周界，才能檢視其面貌、書寫其民族誌。從調查的視角來看，首先是從生命權力和異質空間之間的邏輯關聯出發，而非從生命權力和政治之間的抽象關聯出發。

此處我所依據的是在難民營、內部移居者的營區以及「自行建立」的臨時營地進行調查所獲得的材料，調查地點主要是在黑非洲，另外在近東及歐洲也進行了較為簡略的調查(Agier 2008; Agier and Prestianni 2010)。調查的這些地方，都是與可見的和可進入的社會及國家秩序分離開來的人類設置(des établissements humains)，就此而言，可以說它們是「偏離常軌的產物」(produits dérivés)，因此可以用來對於生命權力進行社會學檢視，並且以對於不受歡迎者的治理來進行人口和領土的管理。它們都是異質空間性的，也就是說，是「外在於所有地方的地方，即便它們實際上可以被標定位置」(Foucault 1984)。可以被標定位置，這讓我們得以對它們進行觀察、得以居住其中，並由此了解其內部經驗以便加以描述。這些「外在於所有地方的地方」，在我對於營區、臨時營地和族群隔離聚居區的調查中，稱之為**外地方**(hors-lieux)。它們實施了三項外在性原則(principes d'extériorité)，這三種**外(ex)**體現了由主權權力所持有的三種最大限度的拒絕權力：治外法權(l'extraterritorialité)⁴、例外(exception)與排除(exclusion)。

4 譯註：「治外法權」原意為某國允許另一國家或國際組織於其國境內行使法

在檢視這些異質空間的同時，我們也就進到生命權力的實際內容。

異質空間首先構成了**在外**(dehors)，即被置於事物正常秩序的邊緣或界限，因此以監禁和**治外法權**為特徵。另一個傅柯的觀念是「監禁在外」(enfermés dehors)，即便它只處於標語的狀態，都有助於對異質空間進行描述。傅柯在1980年代初，為了說明越南「船民」，那些搭船在海上漂流的難民，而在一次富戰鬥性的發言中宣稱：「難民是第一批監禁在外者！」早幾年他曾經說：「船舶，是異質空間的絕佳代表」⁵。要對「塊狀浮動空間」(Foucault 2009: 35)提出一份清單是可能的——稍後我要透過對於形式以及連繫其間的人物所構成的圖式再現，提出詳細說明並進行分析。此外，還必須進入太平洋上的諾魯島和聖誕島，它們被澳大利亞政府用來當作措置阿富汗和斯里蘭卡流亡者的大型羈留中心，好讓這些人無法進入澳大利亞的領土或提出庇護申請；或是在歐洲那些應一位希臘高級官員請求而在地中海巡航的船舶，其任務是要在移民踏上歐洲土地前，就先將他們逮捕、拘禁並遣返。船舶、島嶼、港口等待區(zone d'attente portuaires)⁶、棚舍(hangars)、羈留中心(centres de rétention)、難民營：這些**外地方**是由真正的「塊狀空間」所構成，這項事實指出了一種被監禁的、持久存在的、被隔離開來的集居地的可能性。

然而，治外法權也可以變成由另一種形式所實現的假想，例如「浮動的」等待區——由此，法國在2003年11月通過所謂的薩科齊法(la loi dite Sarkozy)，就將治外法權界定義為所有圍繞著不受歡迎外國人的空間：「等

權。但此處的意義是指某國允許其國境內的某處被當成非國境的「外地方」，以便讓不受歡迎的移民或難民可以不必適用較為符合人道精神要求的一般法律。名義上是不適用國內法，實則是適用特別法。如此一來，由國際公法所約定的「治外法權」，變成國內特別法所限定的「外方法權」；由外國人治理，變成治理外國人。

5 « Les hétérotopies » (電台廣播演講，法國文化台，1966年12月7-21日)，見 Foucault (2009: 36)

6 譯註：根據法國的「外籍人士入境、居留與庇護權法」(le Code de l'entrée et du séjour des étrangers et du droit d'asile)，等待區自登船或登陸的點開始，延伸到執行人員控管的據點為止。

待區延展到外國人應該前往的所在，而不須要採行特別的決策」。2010年10月由法國國會投票通過關於「移民、整合與國籍」的新法律，對於治外法權的假想提出更為明確的規定：只要是以「非常規狀態」涉足法國土地的外國人所在之處，不管哪是一片海灘、一條山徑或任何地方，都自動地創造出「等待區」，以便在法律上將此外國人認定為置身在國家領土之外。不受歡迎的外國人不管去到哪裡，都將有一種專有的「地方」(lieu)圍繞著他的身體，與他一起移動，在所有地方之外。

我們可以看見，一種**例外(exception)**的政治和法律體制，被連結到這種治外法權之上。實際上，從發布異質空間的主權權力的觀點來看，在外的假想是一種純然的幻象，沒有自身的思想、也沒有同一性：它的真實空間被另一個國家的「在內」(dedans)所佔據，或者說，被位於驅逐者內部的一種物質的或法律的假象所佔據。換言之，「監禁在外」事實上是「隔離在內」。在一種無法進入的內部和一種沒有實質的外部這樣的雙重限制之間，生命權力將其人造客體——船舶、島嶼或營區——建構為監禁之所和生命之所。這個人造物似乎置身於空無之中，然而它卻一直「黏附」在一種社會和國家秩序的邊界上。不過，不管它們的實際管理者是誰（人道的、行政的或社群的），如此被設置為異質空間的空間，都有著共同的特徵，那就是排除、延遲、懸置所有對於這些其他空間(espace autres)的佔據者以及一般公民之間的政治平等的承認。有一種政治的例外體制被連結到這些空間上，並且通過治外法權的假想來實施。總是有一道門、一條壕溝、一排柵欄或是一扇大門必須被跨越，以便整合這種特別的生命模式。宣布隔離，為的是將「危機」（一種疾病或一場戰爭的特殊效果）或「偏差」（社會犯罪或「非常規」狀態）限制在某個地方——精神病院、監獄或是養老院作為傅柯所說的異質空間，就是這樣創建的。一種超政治的體制，在政治之外，根據排除性的類屬指定，界定了被放置與被控制在這些空間中的人口該如何管理——被行政界定為不正常、年老、逃難、易被傷害、具犯罪傾向、殘障等等類別的人，如此被指認並被分成不同的群體區隔開來。但是在將這些人固著並區分為集體的同時，這些其他空間也就將其佔據者變成長存的寄生蟲，變成社會意義上的「他者」(autres)。

如此，在法律和政治的層面上是例外，在空間、地方和邊界的組織此一層面上是治外法權，在這兩者之上連結了第三個詞彙——「排除」(exclusion)，用來界定此一詞彙的觀點，是在社會及國家的結構中的（無）位置。那些自行建造的避難處所藏身的首要空間是間隙、空屋、歸屬模糊的場地、森林（或是在都市中的片段樹林）、碼頭。這些空間被棄置的狀態更讓它們的佔據者欠缺領土性公民權的狀況被確認並加重：不論是他們擁有國籍的國家，或者是他們流亡落腳的國家，都無法向他們保證，在他們所在的臨界地方(les lieux liminaires)，公民權會被實行，而只能向他們保證生命會受到保護。正是在此處，在分隔開「使其生」和「讓其死」的那條線上，附著了「生命權利」的人道修辭，讓具有不受歡迎特徵的公民其社會權利被排除，在民主中變得可被接受甚至不可見：「我們外於法律，沒有人知道，然而每個人都如此對待我們。」(Kafka 2008: 62) 在此情況下，非正式的和「地下的」臨時營地等這些由拒絕所衍生的產物，連結上被人道的或是行政的營區、地區和官方中心等直接源於拒絕的產物。它們的佔住者在社會上被驅逐，但這無礙於將他們**多餘／邊緣的**(à la marge)勞動力，在某些需要耗用大量臨時和地下勞動力的部門，像是小生意、家庭傭工、建築業或是農事勞動中，做些零星的且通常未經行政當局批准的使用。異質空間並不總是經濟上無所事事的同義詞，超地域和例外的情況也**因為各種目的**而存在，特別是為了促成對被隔離者的勞動力進行季節性、臨時性的非法使用。⁷

三、監獄、庇護所、難民營：異質空間的當代形象

生命權力在異質空間的施作，構成一種越來越被標定的界限：一種城市邊緣、一種國家邊緣、一種人類界限。只要它們結合了治外法權、例外

7 對於人口和領土的管理，以及對於外國勞動力的管理及過度剝削，這兩種觀點的連結還有許多事可以做。關於這點，參見Alain Morice和Swanie Potot(2010)最近所組織的集體著作所做的調查和反省。

和排除等特性，我們就可以將它們辨識為當代的異質空間，經由調查將它們找出來。由此開始，就有可能確定事物，並且將隔離及限制的不同形式和樣貌結合起來。它們間接地指出了當代異質空間的研究場地。以下三種基準形貌可以將這些場地標識出來：那就是監獄(la prison)、庇護所(l'asile)及避難處(le refuge)。它們彼此有著密切的關係，不僅因為它們三者都代表一種將其佔住者（「監禁在外者」）加以監禁的形式，同時也因為它們表現出一種將彼此連繫起來的曖昧性：對不受歡迎者的管理可以在監獄的人口中找到，監禁有部分可以在庇護所中看到，而庇護所對某些人而言其實就是避難所。這些形貌由特殊空間的不同真實形式所表現和體現，這些其他空間很快就或多或少地變成了他者的空間(les espaces des autres)。監獄位於一個端點，都市的族群隔離聚居區(ghetto urbain)位於另一個端點，它們代表了這些異質空間的意義所指向的兩個極端。至少是基於今日在這些地方所觀察到的事物，讓我們得以著手進行一部比較性和整體性的民族誌。這些形貌和形式所聯結起來的整體，我們將其表現為下圖。

→ 流變

←→ 關係。同源性

原則 Principes	缺乏接待時創造的庇護所 「我在那裡避難」 社群對抗社會 「失序」和「混亂」			介於接待與隔離 介於「生命權」與放逐 介於人道與安全 等等		放逐與懲罰 (在刑罰拘禁前後) 對不受歡迎者的監禁		
形貌 Figures	避難處 REFUGE			庇護所 ASILE		監獄 PRISON		
形式 Formes	都市的 族群隔 離聚 居區	非正式的 臨時營地 外籍人士 臨時營地 ←「叢林」 「隔離聚 居區」 羅姆人臨 時營地	境內流 離失所 者(IDP) 營區	←聯合國難民 署(UNHCR) 難民營 ←聯合國近東 巴勒斯坦 難民救濟 和工程處 (UNRWA) 難民營	←尋求庇護者 的接待中心 (CADA) ←住宿中心 ←移民之家	←行政留 置中心 ←受審訊 者等 待區 (ZAPI)	←拘留 中心 ←監獄中 的留置 處所	←監獄

圖1：異質空間的當代原則、形貌及形式（原圖見附錄）

以幾點評述來說明這張圖。在此整體圖景中，**監獄**代表第一種模型。在對監禁中不受歡迎者的意義和實作進行一般性的思考時，監獄處於一個既極端又矛盾的端點。實際上，監獄一般是懲罰和放逐之處，但當代的監獄也變成了對不受歡迎人口進行管理的空間——在刑期前後，也就是說在刑法之外的監禁時間增加了，就如同監獄人口在晚近這幾年顯著地增長，甚至到達這樣一種程度：監獄現在已經像是監禁不受歡迎者的形式之一，特別是在法國和美國這兩個以監獄來拘禁外國人和不受歡迎者的國家。⁸此外，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留置與驅逐不受歡迎的外國人的政策架構中，當留置中心(*centre de rétention*)缺乏位置時，監獄也被用來作為留置「處於非常規狀態」外國人的地方(Beaulieu-Garnier 2010)。最後，法國的行政留置中心(*les centres de rétention administratives*)（或是在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拘留中心[*centres de détention*]⁹），或是受審訊者等待區(*les Zones d'attente de personnes en instance, ZAPI*)，即使它們與刑罰體系無關，也還是在警察控制下的行政監禁處所。

庇護所代表第二種在象徵上強烈但卻同樣矛盾的模式：庇護所是進入共同世界的接待處和大門，但也是監禁及隔離不受歡迎者（瘋子、老人或外國人）的處所。庇護所的門既用來庇護，也用來監禁。帶著圍牆的庇護所因此是一種就在城市內部的治外假想。正是這一點，使得法國的尋求庇護者接待中心(*Centres d'accueil pour demandeurs d'asile, CADA*)的生活世界(Kobelinsky 2010)，與位於非洲和亞洲的聯合國難民署(HCR)難民營相近似。這也解釋了何以在尋求庇護者接待中心工作的社工，和在難民營中的人道救援工作者會有同樣的不適感。在其內在生命中，由庇護所的這項矛盾原則所豎立起的物質和社會形式，是緊張、衝突或不適的所在，因為行

8 晚近的研究指出在美國發展出一種「窮人監獄」，在法國則是不受歡迎者的監獄，在罪刑框架外的監禁與隔離越來越成問題(Wacquant 2004; Combessie 2009)。

9 譯註：行政留置中心(*centre de rétention administrative*)是由行政部門而非司法部門設置，其用途在留置無合法居留權的外國人，以待其自願離境或被遣返。拘留中心(*centre de détention*)由司法部門管轄，是監獄的一種，用來拘禁兩年以上刑期的犯人。

動者（被收容者／受監禁者以及參與工作者），被維持在一種懸置的時間性中，在其生存的共同規則之不確定裡。

最後，**避難處**在難民營的理據及管理中的作用，於其中人們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被放逐者的庇護所，與領土性、法律和民族國家的社會區隔開來，但它在本質上也以「自我組織的」臨時營地的形式在作用。此處所關涉的是**國內流離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DP)的營區——由國內流離失所者（離開自己的居住地方但並沒有穿越國界的人）所建立的避難所在，是臨時營地，通常在第二時間會看到人道組織前來，有時會有聯合國組織的人員前來提供援助，並將它們重組，移往另一個營區等等。最後，移民非正式的臨時營地（「叢林」、「族群隔離區」等等），它們接近於在都市邊緣自行安置並且通常被容忍的最古老形態，就像在非洲的外國人臨時營地，或是歐洲的**羅姆人**臨時營地。

就如同這些精簡的評述所建議的，傳柯式分析的問題在於，其他空間是、但並不只是生命權力的人造物。在所建構現實的另一個場域，也就是敏感經驗和情境分析的場域，究其極致，這是一個浮現中的社會化處所。當然，人們難以想像在難民營，特別是在非洲或近東的難民營的「造城」(faire ville, Agier 2008)會在歐洲的留置中心發展出來……但反過來說，人們對於在界定自行建立的臨時營地以及族群隔離聚居區時的外部限制（一種將可能長期固定下來的外國人，與城市隔離開來，並加以維繫及容忍的生命權力）也沒有足夠的想像。就如同族群隔離聚居區是一種內在的、內部的社群選擇，是由身分認同的問題意識所提出，也會回到身分認同的問題意識。界定族群隔離聚居區的，不只是與國家的距離(Wacquant 2006)，也不是族群、種族或宗教，而還有其他：正是對治理強權的表述界定了它的界限，也就界定了它們之於國家的距離。「法外之城」(villes hors-la-loi)這個詞是希臘帕特拉的阿富汗臨時營地中一位領袖的用語，即便它們不是經由國家的決策而設立，又如何可以說這些「法外之城」是「外於」國家的決策？正是距離遙遠的國家，促成、甚至鼓勵在邊緣地帶的社群另類方

案，由此最終組織並正當化了禁令地(ban-lieu)¹⁰空間這樣一種社會和政治形式的族群隔離聚居化。這是「禁令」(ban)和被放逐者(banni)的空間，它被與城市隔離開來並被維繫在城市的邊界，就如同被與國家隔離開來並被維繫在國家的邊界。禁令地將自身的邊緣、也就是它的「在外」地方化，並且就在此「在外」之中，圈畫並且監禁所有異質性的觀念，而異質性正是經由相對於城市和國家的解剖(dissection)及分離、距離和對立來界定的。由此，族群隔離聚居區，更廣泛地說都市的「邊緣」，之所以是邊緣或界線，正是因為它處於國家和共同的社會權力的邊緣。再者，治外法權、例外和排除在意義上關係密切。

這因此是一種處於危險的生命，並且必須承認，那些如此活著的人，對於每日必須與之並存的政治冷漠或警察騷擾並不感到驚訝。他們對此嘲笑，也為此受苦，既以此「玩樂」，也由此承受。在針對遷居者、難民和非法移民進行調查的田野現場，我們會聽到臨時營地佔據者用「族群隔離聚居區」、「叢林」，或是「法外之城」來自我指稱。這些詞語賦予他們所佔據和居住的地方一種特有的及承擔的意義（即便從可欲性這項條件來看，此一詞語的意義並不「正面積極」）。我們必須看到，在其中有種對於主體的客觀化和肯認。

從這些嘲諷、自嘲及其他通常以**悲劇性**的方式上演的表現，我們在這些田野觀察到，經驗解構了生命權力的「現實」。我們甚至要說：現實「重占上風」並將生命權力推回虛構，即便在事實上且更正確地說，這並非一場不同現實的衝突。然而，解構生命權力所建置的現實，也不意味著生命權力不被證實。它所意味的是，在這些作為界限和門檻的所在之上，在一個臨界的空間－時間(un espace-temps liminaire)之中，一種就其定義而言不被期待的政治騷動有其可能性。

10 譯註：Banlieu的字面意義為郊區，但其社會意義則是通常由移民及其後代集居的聚落。作者於此處將ban和lieu拆開，兩者各自的意義是「禁令」和「地方」，由此形成一個雙關語，移民及其後代聚居的郊區，也就是禁令地。

引用書目

- Agamben, Giorgio. 1995. *Moyens sans fins, Notes sur la politique*. Rivages.
- . 1997. *Homo sacer: le pouvoir souverain et la vie nue*. Seuil.
- Agier, Michel. 2008. *Gérer les indésirables. Des camps de réfugiés au gouvernement humanitaire*. Flammarion.
- Agier, Michel et Sara Prestianni. 2010. « Je me suis réfugié là ! ». *Bords de routes en exil*. Éditions Donner Lieu.
- Arendt, Hannah. 1995. *Les Origines du totalitarisme. III - Le système totalitaire*. Fayard (collection Points).
- Beaulieu-Garnier, Émilie. 2010. *Étrangers derrière les barreaux. La prison dans le dispositif de mise à l'écart des étrangers indésirables en France*. Paris: EHESS (collection Mémoire de Master [edited by M. Agier]).
- Bernardot, Marc. 2008. *Camps d'étrangers*. Éditions du Croquant (collection Terra).
- Brossat, Alain. 2008. "L'espace-camp et l'exception furtive," in *Lignes*, n° 26: 17-19.
- . 2010. *Droit à la vie?*. Seuil.
- Caloz-Tschopp, Marie-Claire. 2000. *Les sans-État dans la philosophie d'Hannah Arendt*. Payot.
- Combessie, Philippe. 2009. *Sociologie de la prison*. La Découverte.
- Foucault, Michel. 1984. "Des espaces autres," in *Dits et Écrits*, tome IV, pp. 752-762. Gallimard
- . 1997.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5-76*. Hautes études and Gallimard/Seuil.
- . 2009. *Le corps utopique, Les hétérotopies* (textes inédits suivis d'une présentation de Daniel Defert). Nouvelles éditions Lignes.
- Genel, Katia. 2004. "Le biopouvoir chez Foucault et Agamben," in *Methodos* 4. <http://methodos.revues.org/131>.
- Kafka, Franz. 2008(1945). *Journal intime*. Paris: Payot.
- Kobelinsky, Carolina et Chowra Makaremi eds. 2008. *Enfermés dehors. Enquêtes sur le confinement des étrangers*. Éditions Le Croquant (collection Terra).
- Kobelinsky, Carolina. 2010. *L'accueil des demandeurs d'asile : Une ethnographie de l'attente*.

Éditions du Cygne.

Morice, Alain et Swanie Potot eds. 2010. *De l'ouvrier immigré au travailleur sans papiers. Les étrangers dans la modernisation du salariat*. Karthala.

Muhle, Maria. 2006. "Le camp et la notion de vie," in *Le Retour des camps? Sangatte, Lampedusa, Guantanamo*, edited by O. Le Cour Grandmaison, G. Lhuilier et J. Valluy. Paris, , pp. 68-76. Autrement.

Wacquant, Loïc. 2004. *Punir les pauvres*. Agone.

———. 2006. *Parias urbains. Ghetto, banlieues, État*. La Découverte.

附錄

Principes, figures et formes contemporaines de l'hétérotopie

